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调查思想的历史赓衍与新时代突破*

——以经济调查为重点

王 文

内容摘要：社会经济调查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问路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手段。百余年来，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历史探索、纠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内核实现了四个维度的转变（或发展）：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经济斗争到经济建设、从生产到流通。基于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经济调查思想进一步融合时代课题（高质量发展、经济的环境效果、中国式脱贫等），实现新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经济调查思想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1993）的基础上，将经济调查功效延伸至决策贯彻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经济调查；历史逻辑；新时代突破

一、引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在新时代新征程重提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推动力。经济状况是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由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①。社会经济调查是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从个别到一般，发现普遍规律，从而上升为理论，再以此用于指导实践^②。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调查的手段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探索与纠偏，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调查思想不断赓续、鼎新。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调查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丰富^③。其中，赵凌云（2011）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时，曾提及经济调查的工作方法；蒋建农和洪向华（2021）在考察习近平的调查论述与实践时，重点考虑了经济因素。从更精准的经济调查视阈出发，针对中国共产党经济调查历程与思想的专门研究呈碎片化，郭华等（2003）考察了毛泽东的经济调查研究方法，文世芳（2018）虽从中国共产党群像出发，但其考察时间仅限于1979-1980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调查思想经过百余年的历史沉淀，有其独特的生成、演进逻辑，是中国经济工作的问路石。因此，有必要以全局的视角

*王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15729386612@163.com。

①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

② 杨国栋主编：《中国社会经济调查手册》，新华出版社，1997年，序第1页。

③ 罗平汉（2009）、孟庆延（2018）、叶兴庆（2022）、章义蓉（2022）、丁俊荣（2023）等已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实践历程和思想发展进行梳理。参见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孟庆延：《历史社会学视野下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多重意涵》，《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叶兴庆、王舒琪、李荣耀：《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章义蓉：《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实践历程、基本逻辑及经验启示》，《甘肃理论学刊》2022年第3期；丁俊萍、樊容均：《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23年第1期。

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调查思想进行专史研究，系统考察其形成的立足点、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着力点、思想内核的发展点及新时代的突破点。

二、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用调查手段考察资本主义下农民和工人被剥削的生存实况。《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184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1845）、《工人调查表》（马克思，1880）等文体现了这一理念。首先，马克思认为调查研究是了解各种关系客观本质的基础。《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谴责政府对摩泽尔农民贫困生活的冷漠态度，讽刺政府不进行调查却靠臆想美化农民的生活。其次，调查需要政府的参与、监督以保证调查材料真实，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德政府在计算摩泽尔地区纳税人的总收入时，所用的资料不实。马克思将其归咎于德当局的缺位，调查仅凭个人力量无法得到农业及农民经济状况的精确材料^①。最后，调查研究要深入人民内部。《工人调查表》从工作时长、工作组织、工作待遇、生活质量等四方面调查工人生活现状，问题设计贴近工人实际生活，唤醒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反抗意识。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时，到贫民窟与工人一起生活 21 个月，体会工人生活疾苦^②。恩格斯通过亲身调查与实践，搜集到大量前期调查报告等官方文件、贫民窟居民口述等非官方文件，著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是唯物主义调查的成果，对资本主义框架下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全面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列宁也十分重视对经济状况的系统性考察，及调查结果的正确性，并将调查作为政党经济工作自查自纠手段。“正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状况”^③。为全面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列宁认为政府统计机构有必要将全区的调查结果以系统的形式叙述出来^④，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系统地展示了农户调查结果，成为列宁分析农民经济的关键参考。《1894—1895 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深刻批判民粹主义调查结果的主观性，强调调查的结果必须是客观的、正确的，反映经济实况^⑤。十月革命以后，为纠正党报宣传内容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状况，列宁指出要认真研究在经济建设中各单位“是否真正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⑥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调查方式来了解民间疾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2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273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6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 页。

⑤ 1896 年，由彼尔姆地方自治机关出资出版的《彼尔姆手工业状况概述》，民粹派主观地运用彼尔姆调查材料，采取大小手工业平均的方式，证明资本主义未在手工业发展。民粹派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

⑥ 《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92 页。

李大钊的《可怜人力车夫》一文指明北京人力车夫收入与付出劳动不相匹配的状况，表达了对人力车夫群体的同情^①。1920年，陈独秀安排郑凯卿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后来，郑凯卿根据陈独秀对调查内容、方法的指示，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的工人状况进行了调查，汇成调查报告《武昌五局工人状况》^②，被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新青年》是李大钊、陈独秀宣传调查思想的主阵地，曾刊登一份《社会调查表》（1920）供调查者们参考，其内容包含农业、工业、商业、人口、风俗、教育、自治组织等调查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了大量对劳动人民的调查报告：《江苏省江都县劳动状况调查表》（铁民，1920）、《汉口苦力状况》（刘云生，1920）、《山西劳动状况》（高君宇，1920）、《上海劳动状况》（1920）、《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杨赓陶，1920）、《南京劳动状况》（莫如，1920）、《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少穆，1920）、《北京劳动状况》（李幽影，1920）、《长沙劳动状况》（1920）、《唐山劳动状况》（许元启，1920）等。这些报告揭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生活困苦的实际，是了解当时中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马恩的调查思想最先影响国内第一代共产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进行周密调查，是了解情况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使我们具有对中国问题的最基础知识”^③。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调查的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立场”“自查自纠”等理念也在马克思主义调查观中有迹可循。

三、着力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

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调查研究把握着中国经济的时代脉搏，助力经济工作在关键节点上作出正确决策。

（一）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厘清中国基本经济关系（农村生产关系、商业及富农区别）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进程，以指导革命为目的，将经济作为研究的主要方面，开展经济调查活动^⑤。1927年，《中共中央

① 守常：《可怜之人力车夫》，《甲寅》1917年2月10日。

② 《武昌五局工人状况》，《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第123—128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第3页。

④ 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第1版。

⑤ 农民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进行了一些农民调查。例如：1923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利用假期时间回乡调查；1926年，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颁布《中共中央农委通告第一号——报告各地农民运动情况和计划，进行农民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系统的农民状况调查；1927年毛泽东进行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考察，其成果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调查侧重于农民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的考察，目的是找到可以接近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并未将经济作为考察的主要方面，因此不在正文中论述。

工作计划》指出要做好“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调查与统计（第一步特别注意重要省份的调查和统计），建立党的政策之科学的根据”^①。

毛泽东通过宁冈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了解中国农村生产关系，进而区分农民内部成分，指明土地斗争对象与保护对象。1927年的宁冈调查，中国共产党初步了解湘赣边界的政治与经济状况。1930年，红四军在寻乌县城等地胜利后，因分不清城市商业与地主财产的区别，一度将城市的商业店铺查封、没收，造成城市居民生活不便，甚至引起了一部分城市平民的不满。为了解中国商业及富农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寻乌调查，包括寻乌的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方面。寻乌调查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1930年的兴国调查及时纠正了土地错误分配问题。兴国调查使毛泽东发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而实际执行中普遍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此后，毛泽东又作了木口村、长岗乡、才溪乡等调查，调查内容更加全面，经济方面包括：劳动力与农村生产、合作社运动、社会救济等方面。

（二）20世纪40年代，张闻天的晋陕调查明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任务

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活动，中国共产党已搜集到一些国内经济方面的资料，但这些材料是零碎的。为了更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革命问题，毛泽东强调进行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工作^②。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动员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党内成立考察团，分赴不同方向进行调查研究：一是由林伯渠带领的陕甘宁边区考察团；二是由高岗带领的西北局考察团；三是由张闻天带领的延安考察团。这些调查搜集了大量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统计材料，其中，延安调查团的成果最丰厚，且对农村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张闻天对农村基本经济状况的调查十分详细，包括：劳动力分配、土地分配、役畜分配、物价高涨、农民经济是否自给自足、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农民物质生活、农村高利贷组织等。根据调查，张闻天提出农村仍然存在“经济上的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问题，并指明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重点：加强队干部的政策性教育；精兵简政，公粮、村摊款力求公平；认真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安定社会秩序，提高生产情绪，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切实解决农民在生产上的实际困难问题^③。

（三）20世纪60年代，全党的社会调查纠正了农、轻、重发展比例失调问题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

①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0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4页。

③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造成了经济失衡。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会上指出当下国内经济情况不明，方法不对，“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县委、公社的情况，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①。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同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发毛泽东《调查工作》一文，作为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性文件。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分赴全国各地调查^②。此次调查发现农村经济存在“队困民穷，集体负债，社员倒挂”等现象^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衡。根据调查研究结果，中共中央拟定《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调整了工业内部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问题，以及企业内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纠正了企业管理混乱的问题，对促进我国工业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④。

（四）20世纪80-90年代，邓小平的社会调查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进一步拉大国内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⑤。为了解国内技术水平状况，邓小平于1978年9月到东北地区工业一线进行考察，先后到本溪钢铁、大庆油田、鞍山钢铁公司、天津黄纬路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等地，并发表了北方谈话，探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我国工业建设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们国家的企业迫切需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能力。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为了避免“左”与“右”对经济建设的消极影响，邓小平先后对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考察。1992年初两个月内，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先科激光公司生产车间、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生产一线，并重点考察了广东农民收入情况和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的经济情况。邓小平南方谈话呈现出以下经济建设要点：抓住时机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补充了过去只讲发展生产力，而不讲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

①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② 毛泽东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带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并亲赴津浦、浙赣、京广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刘少奇赴湖南、周恩来赴河北、朱德赴华东各省及广东、陈云赴上海、邓小平及彭真赴北京郊县等地调查。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

③ 《田家英嘉善调查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制定》，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7页。

⑤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6页。

些，敢于试验。^①此次谈话解放了党内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1992年，江泽民在此基础上创见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②，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这一论断受到邓小平赞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利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抉择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当前，世界经济错综复杂，国内面临“三期叠加”、后疫情经济风险等复杂情况，对国内经济现状进行科学调查，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四、发展点：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内核演进

政党对国民经济经济的领导作用直接表现于他的经济政策^③，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手段，政党在复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计划、措施。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经济调查思想与时俱进，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侧重于经济的不同方面。

（一）从调查地域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内核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资本主义低度发展，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农村。在农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以长沙为例）^④。农民与地主的权力对抗决定了农民运动的必要性，农村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⑤。为了实际代表全体贫农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农民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的农村调查，不仅紧密地联系了人民群众，而且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打破了重农村、轻城市的思想束缚，转向农村与城市并重。

20世纪30年代，随着红四军在城市（大余、南雄、信丰、安远、会昌、寻乌等县城）的初步胜利，中国共产党需要了解城市贫民及商业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社会经济的调查区域拓展到城市。《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⑥。《分青和出租问题》不仅提出了农村分田问题，而且提出了城市失业工人的分田问题^⑦。《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表示要通过城市调查系统了解城市中的阶级关系、各种

① 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1页。

②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所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对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

③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9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⑦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页。

经济成分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避免在革命过程中侵犯私人工商业^①。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系列城市调查工作，经济方面的调查包括：市民阶层的变化和生活情形；各时期工厂商店及大小买卖增减；物价等。形成了《蒋管石门调查》《潍县初步调查材料》《潍县的经济》《南京调查资料》《南京概况》等书面调查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大中城市提供了理论铺垫。

（二）从调查对象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的发展

1927-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重点在农村，调查工作侧重于农业，工业与商业是调查工作的薄弱环节，形成了清楚农业、不清楚工业的认知局限。“五反”过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工业已有基础了解，但对手工业、小工厂，商业和市场情况依然不明^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为摸清工业状况，提出合适的工业发展建议，邓小平提出针对工业的调查研究，“农业上的问题大体相同，工业则不同，几十万个厂子千差万别，我们要放下官架子，自己搞些经验”^③。1961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与调查研究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工业战线调查，找善于调研的人，从历史、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找出共同点，提出若干条工业建设指导意见。在工业调查中，要抓住大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关键项目。例如：每年如何搞十套年产二万五千吨化肥设备，松辽平原一千五百万吨石油哪年能搞出来，几年能搞多少台拖拉机等等^④。同年4月至7月，邓小平先后到北京、东北地区调查并发表谈话。谈话指出工业发展的三个要点：一是以工促农，公社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通过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提高社员收入。二是对工业要摸底，搞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三是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实现工业增长，企业问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是企业管理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另外，用经济的办法让企业自负盈亏，才能实现经济增长^⑤。

（三）从调查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内核经历了从“经济斗争”到“经济建设”转变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分清革命敌友。初步将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

①《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③《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④《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⑤《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2、101、104-105页。

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

级、小资产阶级是最接近的朋友”^①。《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等调查成果针对农民和工人群众，集中研究了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分田问题等。这些资料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和工人进行工农经济斗争提供了现实依据，从而制定合理经济斗争策略。农民经济斗争通过清算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囤积居奇等保护农民利益^②，工人经济斗争通过罢工与谈判提高工人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敌我经济斗争的过程中，经济调查的指导思想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以保证前线供给、反经济封锁为目标进行经济工作，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成分更加包容。调查对象进一步扩大，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国民党军官等^③。1941年，张闻天在兴县调查土地产量时，创见地提出“容许部分封建主义存在”“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扶助大多数小农经济的发展”等观点^④。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形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经济各方面的基本认识，形成了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1942年，《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公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系统探索和总结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理论^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查，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1955年末，中共中央采取调查与汇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听取各部委进行汇报，经济方面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等基本状况。同时，陈云先后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组织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汇报、物价座谈会等。朱德到山西、辽宁考察经济发展情况。通过几个月的汇报与调查，《论十大关系》指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目前的形式和任务是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四个现代化建设^⑦。调查研究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⑧。1983年，赵紫阳提出10个需要调查研究的经济题目，即引进人才工作、建筑建材业的发展、食品饲料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素质、利改税、计划工作改革、价格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劳动工资改革和机关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③ 1940年9月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电：请做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国民党军官的调查工作。每省调查数十人到一百人，由各省党委分别负责。请周恩来负责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来电精神，具体布置了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66页。

④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⑤ 参见：赵凌云：《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1921-201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工资改革^①。

（四）从调查环节来看，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经历了从“生产”到“流通”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经济环境恶劣、物质匮乏，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②“生产第一，分配第二”^③。经济调查集中于对农村生产的考察，其主要方面包括：土地生产、土地变动、租佃关系、阶级关系等，对商品流通的调查研究较薄弱。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共产党的调查视野逐步扩大，考察国内市场的供给、需求、分配等方面，并逐步延伸至国际市场中，一改重生产轻流通的局面。20世纪50年代，对统购统销粮食问题的调查考察了粮食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随着统购统销经济政策的推行，粮食征购逐渐出现强迫命令、畸轻畸重的现象，农民产生抵触情绪。针对这一问题，1955年陈云到江苏小蒸乡进行实地调查，重点研究两大问题：一是农村周转粮（调剂粮）的问题，二是对农户统购多少、留粮多少、缺粮怎么办的问题。同年，毛泽东起草《关于调查粮食问题各项情况的通知》，并派身边的几位警卫回乡调查。基于这些调查结果，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公营暂行办法》，形成农村粮食“三定”到户和城镇粮食供应定量到人，统购统销制度基本成型。

20世纪60年代，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考察了农业生产的分配准则。

《农业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牲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毛泽东认为“三包一奖”制度用脚去生产，腰去分配，算账算不清，搞平均主义^④。为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邓子恢提出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将分配权下放，大队成为各生产队在经济上的联合组织，把生产权与分配权统一起来。196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邓子恢率工作组到郑州、南昌、福建龙岩就此进行调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提到分配权下放后，新泉北村采用基本口粮、劳动粮、照顾粮相结合的分配办法，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山西潞城县、晋城县进行调查。调查后，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山西潞城县、晋城县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经七千人大会讨论后，1962年中共中央办法该《指示》，《指示》确立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分配准则。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27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6页。

③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4—285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调查视野进一步拓展,进行国际市场的考查。1987年10月王健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观点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87年11月下旬至1988年初,在对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市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国务院形成《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考察报告,要求沿海地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开放地区包括100多个市、县,深入到了沿海基层,形成对外开放的第三个层次,进一步融入到国际市场中去。

五、突破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新发展阶段以来,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对新的经济形势分析和判断的重要方式,也是积累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科学手段。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融入时代特色,实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辩证统一、集中性与常态性的有机结合^①。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以高质量发展为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②。转向创新驱动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也是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新课题。《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方案》明确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情况是调研的主要方面。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雄安新区考察时指出,雄安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要重点关注营商环境、聚集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绿色发展等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对高质量发展的关注,与从“经济斗争”到“经济建设”再到“现代化建设”等调查思想一脉相承,且更进一步。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将调查对象延伸到经济的环境效果

为考察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到内蒙古进行考察,并提出内蒙古绿色经济及生态工作重点。绿色产业方面,习近平重点关注了中环产业园,到生产车间实地查勘产品生产流程,详细了解园区企业半导体和光伏材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情况。他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

^① 朱小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0期。

^②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环境保护方面，内蒙古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天然林保护和水土保持、荒漠化治理和湿地保护等工作仍需加强，构筑北疆万里绿色长城。此外，习近平在雄安新区进行调查时，特别关注了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及清淤疏浚、百淀连通等工作进展情况。习近平强调，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统筹谋划，扎实推进。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更关注中国式减贫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经济发展是扶贫的根本途径，扶贫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调查以扶贫为重点考察对象。中国共产党在调研中创新扶贫理论、改进扶贫工作。2012-2013年间，习近平多次到阜平、定西、琼海、湘西……等地的贫困地区走访调研。2013年，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在湘西首次提出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概念^①。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颁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以文件形式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方略。2015年，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扶贫工作时，进一步提出“六个精准”^②。这些科学论断成为指导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指导思想。2020年，在脱贫攻坚的关键决胜之年，习近平根据多地调查结果，在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座谈会上提出脱贫攻坚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并指出这些现象与调查工作的不合理有极大关系，扶贫调查工作存在问题：一是过于繁杂的调查表、花名册、信息采集表、帮扶卡、走访记录等让驻村干部应接不暇；二是检查与调研过多，分散扶贫工作者精力，耗费财力（一位县委书记反映，曾在一天内接待了国家、省里、部门、市里的4个检查组和调研组，应接不暇）；三是调查研究不深入，指导工作脱离实际，政策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贫困地区仍存在管理不精细、资金使用问题（优亲厚友、识别不准等）。通过调查对实际情况充分把握，提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自我纠正，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的主要成效。

最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调查思想将调查的功效延伸至决策贯彻层。中国共产党的调查思想肇始于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是连着实践与真知、信息与决策的桥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渐进地将调查的方法应用于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讨论、决策与贯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从而寻找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在此背景下，1930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③确立了调查之于问题探索、讨论的重要性，防止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倾向。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发现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① 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论坛》2015年第30期。

② 《六个精准》，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06/c413700-29519522.html>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大问题，从而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993年，江泽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指明调查之于问题决策的重要性，“历史经验表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①。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如何通过调查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课题。2023年，《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指明调查之于决策贯彻的重要性。习近平不仅强调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而且重视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确保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决策贯彻执行需要高效的落实机制，而决策贯彻落实的成效靠基层群众的检验。在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大兴调查研究，奔着问题去，切实帮助企业和基层解决困难”，“要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改革落实机制，下更大气力抓好改革督察工作，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基层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感知最真切，群众路线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调研聚焦民生问题。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时，组织了基层代表座谈会。会议专门邀请了最直接参与经济社会生活、改革发展与生产的一线工作人员，既有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扶贫干部，也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农民工、快递小哥、网店店主等，了解基层实际，倾听基层群众心声，以便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经济与民生改革措施。

参考文献

赵凌云，2011：《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1921—201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02—103页。

蒋建农、洪向华，2021：《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期。

郭华、王华生、李伏清，2003：《浅谈毛泽东经济调查研究方法》，《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S2期。

文世芳，2018：《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的经济问题调查研究与改革总体规划》，《中共党史研究》第12期。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CPC's investigation though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cusing on economic surveys

WANG wen

Summary: Economic investigation is the "guiding stone" of the economic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a scientific means to combine Marxist theory with Chinese economic realit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ploration and cor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problems, the cor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vestigation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r development) of four dimensions: from rural to urban,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from economic struggle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from production to circulation. Based on th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conomic survey thought in the new era has further integrated the issues of The Tim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economy, Chinese-style poverty alleviation, etc.) and achieved new breakthroughs.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economic survey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extends the effect of economic survey to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on the basis of "no investigation, no voice" (1930) and "no investigation, no decision-making power" (1993).

Keywords: CPC; Economic survey; Historical evolution; Breakthrough in new era